

游幻境指迷两朝事 辩是非长嗟红楼梦^①

——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形态转变

读前提示：为了方便阅读，**红色**和**蓝色**框内的内容分别代表一种观点。

正是冬日的午后，橘色的三教却暖融融的，催动着慵懒在体内蔓延开来。看着教室里自习的同学睡倒了一片，小王也感到大脑和眼皮开始沆瀣一气地不听使唤。就趴个 15 分钟吧，小王把头往小臂上一枕，顷刻间便恹恹地睡去。迷离间，小王自觉通体轻盈，被微风携着入了一明堂。堂内雕梁画栋，奇香四溢，唯正中摆放一巨大的西洋落地铜镜，显得不伦不类。小王正要上前细看，铜镜却先振声问道：“来者可是王卷？”

小王见一死物不但能言，还直唤自己的名字，口中答是，心中不免骇然。铜镜又说道：“我猜你是在奇怪，这古色古香的屋子，怎么混入了个西洋物什。你且细看，这屋子表面上直栏横槛，实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不消说，是我西洋建筑学之智慧结晶。因此我西洋之物才是主体，而那屏风画壁，不过是毫末之装饰，千百年未有大变。**正如你熟悉的中国，倘若不与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接触，又怎能脱离封建文明之阶段，迈入现代化，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

小王见铜镜出此谬论，不由哂笑，心中忖到：“这般‘冲击-反应’模型之旧论不知已遭多少批驳，连这种历史观的泰山北斗费正清教授都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你却又抬出来大放厥词，实在可笑。罢了，我且与你把个中道理说上一说，让你心服口服。”

于是清清嗓子，朗声道：“**中国自明代中后期便有资本主义萌芽**，证据确凿，史料充分，我且从**生产、交换和市场**三个方面与你细细说来。

生产方面，因为高粱、玉米、番薯等新型主食的普及，土地得以被腾出种植经济性作物，出现了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增长。对其加工需求的大大增加使得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最典型的便是棉布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发展迅速，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煤和铁的用途增加，产量增长，生产技术明显进步。

交换方面，作为通货的白银大大方便了交易，齐备的水陆交通工具保证了全国性的商路的出现，更不必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商业市镇和专业性的市集。

市场方面，当需商人穿针引线。而明朝自成化、弘治朝起，全国各地商人便十分活跃，不但有专业性的商人，并形成了一批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这些商人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加强了商业组织的结构使之更为严密高效，商业成为一门值得钻研的‘学问’，一个明证便是商业和商品教科书开始出现。

这样全方面的进步，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滥觞之时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能说中国只能拾西方之牙慧来走向现代化呢？”

“说得好，说得好啊！”铜镜不慌不忙，“你我皆知，**向资本主义过渡需要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社会分工和资本积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你上面论述种种，无非是想说明清时已经出现了这些因素了吧？”

^① 取自《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而“红楼”又与北大沙滩红楼暗合，有双关之美

“不错。”小王有些得意。

铜镜轻笑一声：“只可惜你洋洋洒洒阐述之因，未必能结出资本主义之果。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大不相同，**在欧洲，城市是工商业者的大本营，是向封建阶级进攻的桥头堡。**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工商业者与官僚和地主阶级，或重合，或依附，或受制。简单地说，城市居民中有地主、官僚、工商业者及一部分下层吏民，他们往往都在农村拥有土地，农业收入占他们收入的一定分量，因此**中国的城乡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配合的。城市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而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换中心！**

当然，也有没有土地的普通的工商业者，可他们或是追随地主官僚，或是在经商的许可和场地等方面受制于地方上的地主势力，终归不能和地主达到纯粹的经济关系。

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你又怎么能指望工商业阶层能顺利地发展壮大，颠覆封建地主和官僚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呢？”

小王暗自诧异，这铜镜角度刁钻，却句句属实，看来自己不可再轻敌大意。他略一思索，旋即回应道：“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全面。**明清城市的形成主要有 2 种类型**，你说的是**开封型城市**——在明初成为周王朱橚的封地后逐渐演变为一座典型的亚洲消费城市，同时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封建贵族、官僚、地主服务的。但另一种**苏杭型城市**更不可忽视，它们的工商业比重较大，可堪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心。而且明清之际江南最为富庶，贡献天下财赋三分之二，在体量上足以满足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资本积累的需求。

还有一点，你既然谈及中国的特殊情况，我倒也要指出一项。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大量劳动力涌入山区。而山区较难种植粮食这类直接消费的产品，因此其产品的商品性更强，雇佣劳动更多，比平原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更接近于手工工场阶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出现了‘专靠赁田栽烟’的租地农。总之，**山区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只盯着城市恐怕会有失偏颇吧！”

铜镜沉寂片刻，说道：“好吧，姑且不论工商业阶层能不能发展起来。退一步说，**就算他们能一度通过商业活动积累大量财富，且能自由支配，他们会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吗？我看不见得。**根据史料记载，不少商人在赚得盆盈钵满后并没有图谋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反而走回了购置土地田产，成为地主的老路。这既是因为地租的获取更为稳健长久，又是由于土地的占有意味着特权的赋予，而商人也想分享特权，获得一种近乎士绅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中都有一种反对集中，追求平均普遍发展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以及集中流通。你看，就算资本积累的界限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越过，这思想的桎梏又怎能被轻易砸碎呢？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吧？”

小王立即反驳：“明清时的主流思想确实依然保守，商人复归于地主的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你也应该看到**旧的思想体系正在遭受巨大的冲击**。依旧从史实出发，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涵盖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多个方面，对商品的多样性和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享受’被正大光明地摆上台面；有的地区的社会财富积累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好殖田产到竞趋于工商。

至于你说的思想著作，中国也不乏主张崇奢黜俭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家，例如陆楫、

黄宗羲、唐甄、王夫之等；明清之交时的经济思想界掀起了对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争论，但这和一些肯定商人和高利贷在经济里的地位和作用的惊人观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一切都说明新的经济因素已经在夹缝中生长出来。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体量都异常庞大，转舵较慢再正常不过。更何况**站在任何一种新思想萌发的时间节点，恐怕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它究竟是否有倾覆旧世界的能量**，这样的道理在中国自然也是适用的吧。”

铜镜又切换了一个角度：“思想的发展，起起落落，倒确实难以辩出个定数，可商业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内生于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的角度总归更多些。事实上，**明清时的资本积累过程总是夭折中断**。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封建政治的影响，财产十分不稳定，大起大落迅速而常见，这降低了人们扩大产业的倾向，毕竟不知何时辛苦积攒的财富就会易手甚至湮灭，不如早早用于享受；二是由于多妻制和遗产继承均分制，巨额的财富很难形成有效的代际传承。我这样说可不是仅限于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有大量地方志记载的支撑。

这样看来，中国的资本积累就算有意为之，也会受限于上述的客观条件而步履维艰。现在你应当无话可说了吧？”

小王定了定神，资本主义萌芽的屡屡夭折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倘若强行抗辩说“有足够的时间就能发展起来”又难免有胡搅蛮缠之嫌。他阖目沉思，片刻后突然有了灵感，大声说道：“明清时的资本积累受到你所说的诸多掣肘，这不假；资本主义萌芽常常中断，也是事实。但这两者存在多少因果关系却还有待商榷。譬如明末地方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如火如荼，但先是经历了小冰期的粮食歉收，又受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重创，南明朝廷内部还争斗不休，各种偶然必然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而清军入关后，由于带有浓厚的北方少数民族较原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残余，大片地圈地蓄奴，导致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严重倒退。这种**朝代更替，是以百年为时间单位的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已经超出了你所说的社会经济条件限制的一般框架**。

清代在政局稳定后，也逐渐展现出相似的资本主义发展态势，而且很多商铺字号对社会环境有极强的适应性。相关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谱系在鸦片战争前后有继承关系。很多百年老店在发展过程中也历久弥新，积极自发地向资本主义道路靠拢，例如北京同仁堂在天津的分号达仁堂等。而**鸦片战争后，许多本土资本破产则需要归因于官僚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打击**，这又是新的因素了。

总之，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屡遭波折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其发展的土壤，而应该结合历史背景，在大的历史潮流中看待这个问题。况且，**仍然有一批本土资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活跃的商业活动**，例如镇海方家方介堂，李家李也亭等，他们是中国本土资本能够长时间繁荣发展的极好证明！”

言毕，小王长出了一口气，想着总算把皮球踢了回去。不想他这般说法恰好中了铜镜的下怀，铜镜不依不饶：“你所列举的民族资本，无不是家族企业，世代经营，很多甚至是以宗族为根基生长起来，这恰揭示了明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商人虽然积累有一定的资本，但商人和商业资本有的和地主官僚关系十分密切，为他们服务，有的则和农村与乡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考虑到地主和乡族势力之间往往沆瀣一气甚至干脆重合，

例如地主往往通过宗法系统加固对农民的管理与剥削，商人几乎不可能独立于乡族而存在，而是成为乡族势力的敛财工具、代言人、帮凶甚至附属物。而倘若乡族势力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有些乡族会规定生产技术的应用，限制资本的增殖和积累，甚至把现有的很多生产技术保护起来，不传给家族以外的人；他们对开矿、烧煤、种经济作物等非传统的经济活动也大加阻拦，只为保证地租的安全和封建制度的安宁，防止自然经济的动摇。

更普遍的现象在于，乡族倾向于把本地区打成一个闭锁、自足的经济单位，如乡镇间竟有独立的度量衡制，纳税单位要按照乡例而非国法来缴纳公赋等。为了进一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积极插足工商业，形成你提到的族商，族工，以致商业资本越发达的地区，反而乡族势力越强大，传统封建道德观念越浓厚。至于对财产权外移进行积极的干涉，限制人口的自由迁徙，控制本乡族人口劳动力的外流，打压客民的入籍，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但乡族也不可能全然违反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吧？在发现了攫取利润的机会后，地主阶级也开始采用资本制家内工业、包买主、包租农等形式剥削农民，这客观上不是促进了社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和这些经营性地主的资本积累吗？你把乡族说得这么一无是处，那明清时星罗棋布的资本主义萌芽又从何而来呢？”小王很不服气。

铜镜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这样想，是因为你太过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而忽视了社会形态转变的其他要素啊。难道乡族，或是其所属的地主阶级，代表的只是落后的生产力吗？除了我提到的对经济的干预，乡族还建设族有圩场等宗族设施；颁布乡族内部的私税私捐，例如“丁亩钱”；把各种对农民的统治措施通过传统惯例固定下来，如设立禁约等。这说明乡族早已超越了对地方经济有极大干涉能力的豪强身份，而成为一个和官僚机构分享权力的政治实体，一个社会管理单位。

一个经济实体，它的统治力依赖于它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制度的先进性，而当它不再在经济运作中占有优势时，它的日落就不可抗拒地开始了。但一个政治实体，却能动用更广泛、更深入的资源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在它越接近死亡的时候，它就会进行越猛烈的反扑。因此，在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宏大过程中，无数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要经历坍塌和重建，其遭遇的阻力，不是一句生产力必然向前发展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我们看到的沿革，写在纸上时轻易得唾手可得，投影在真实的世界里却难于挟山超海。

说回我们在讨论的乡族。明清阶级对立的相关规定和现象是很显著的，但因为在阶级对立中还有乡族的结合、拟制的血缘关系、同姓通谱、异姓称族等，不同阶级和阶层通过联姓关系结合了起来。乡族势力会利用祠庙公堂、族规来约束，用族内的公益设施来联结整合乡族关系，加强了阶层的通融性。以及如我们之前谈到的，乡族势力把本该成为他们掘墓人的工商业阶层也融合了进来，进一步造成了阶级关系的复杂和混乱。

这样一来，作为被剥削者的农民阶级，与乡族有经济冲突的工商业者，他们都被嵌在以乡族利益为中心的精心设计的大图景里，使乡族势力得以永远在地方上扮演政治和经济双重统治者的角色。然而，这样一种区域间割裂，带有村社制甚至奴隶制色彩的社会管理方式，怎么能与资本主义制度兼容呢？地主阶级绝不会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既有地位，他们所做的看似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只是为了把其中不至于动摇其根本的

部分纳入他们的统治体系，使之更加牢固罢了！”

小王有些晕眩，他感到这些说法既熟悉又陌生，恍惚间他听到自己说：“我承认你说的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善于吸收、扶植、利用村社制、奴隶制这些前社会的残存物进行伪装和改造，延缓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但一方面，**这终究只是延缓，不可能永久地抵消新的生产力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历史的转折点往往是偶然和必然的糅合**，正如新教改革的野火在全欧洲蔓延之前，没人能想象天主教廷的权威居然会受到动摇。

与你这一番争论，确实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要说中国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就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或是无法迈向其他形式的现代化社会，我还是实在无法苟同。”

话音刚落，整座屋子突然剧烈晃动起来，横断梁折，震耳欲聋，将欲倾颓。小王惊恐地大叫：“你好生不讲武德！我们本是就事论事，你何必因意见相左，就要我性命！”地动山摇间，巨大的铜镜向前倾倒，直向小王身上压来。小王用尽浑身力气向旁边闪避，就在倏忽之间，他眼前一黑，再睁眼看时，发现自己正直挺挺地坐在三教的座位上，额头上布满了细汗。他又往周围看去，刚才没读完的书倒扣在桌子的另一侧，电脑的呼吸灯依然不紧不慢地闪着，只是下课铃声已经响到第二遍了。